

入夜，我常常想念田野里的野花。它们固然勇敢。但仍娇美。我想像手指肚大的
花盘仍在黑夜里仰着脸，
数天上的星星。它们可能以为野花
开在天上就叫星星。星辰如此小，也像在风里摇晃。

铁凝 莫言 迟子建 等著
《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编

人的城

《散文海外版》
2017年精品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散文海外版》
2017年精品集

铁凝 莫言 迟子建 等著

《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 编

人的
城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城：2017《散文海外版》精品集 / 余秋雨等著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306-7455-0

I. ①人… II. ①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3502号

选题策划：王 燕 装帧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王 燕 徐 姗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字数：300千字

印张：23.5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52.00元

特别推荐

- 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 铁凝 002
- 陶渊明：何为风度 张炜 013
- 我的世界下雪了 迟子建 023
- 马的眼镜 莫言 028
- 书架上的他 余秋雨 032
- 生与死，死而复生 余华 053
- 永远的田园 熊育群 057
- 我们的“读博”岁月 金宏达 072
- 幼年往事(外一篇) 杨绛 081
- 进山东 贾平凹 086
- 纽约四重奏 王安忆 091
- 我的父亲冯友兰 宗璞 102
- 母亲百岁记 冯骥才 110
- 焚泥结庐 傅菲 113

作家视野

- 日子 胡竹峰 130
- 资江排歌 李清明 140

大地上的居守	陈洪金	151
我的文青时代	王跃文	157
少年眼	沈念	160
死胡同	李登建	167
白昼的倒影	周齐林	178
读《大中诗钞》有感	李存葆	185
桑多河畔	扎西才让	192
玄妙之眼	周蓬桦	198
乡味	葛亮	210
家口	季栋梁	212

性情写作

沂蒙往事	厉彦林	222
我爸认识所有的鱼	冯唐	228
白露微凉	李万华	230
长袖曼舞的时光	葛水平	238
村庄册页	洪忠佩	245
水、茶叶和紫砂壶	黄永玉	253
天香桂子落纷纷	陈佐洱	257
林中小木屋(外一篇)	谢德才	265

作家专栏

雨水趴在玻璃上	鲍尔吉·原野	272
---------------	--------	-----

角(外一篇) 冯景元 284

别具只眼

地坛草木 刘梅花 292

肖恩教授 吕明烜 301

跟着父亲读古诗 潘向黎 306

音乐的加冕 阮波 312

人的城 邱华栋 320

青莲记 王祥夫 332

纸上天堂 盛可以 334

人生漫游

行走在东山 范小青 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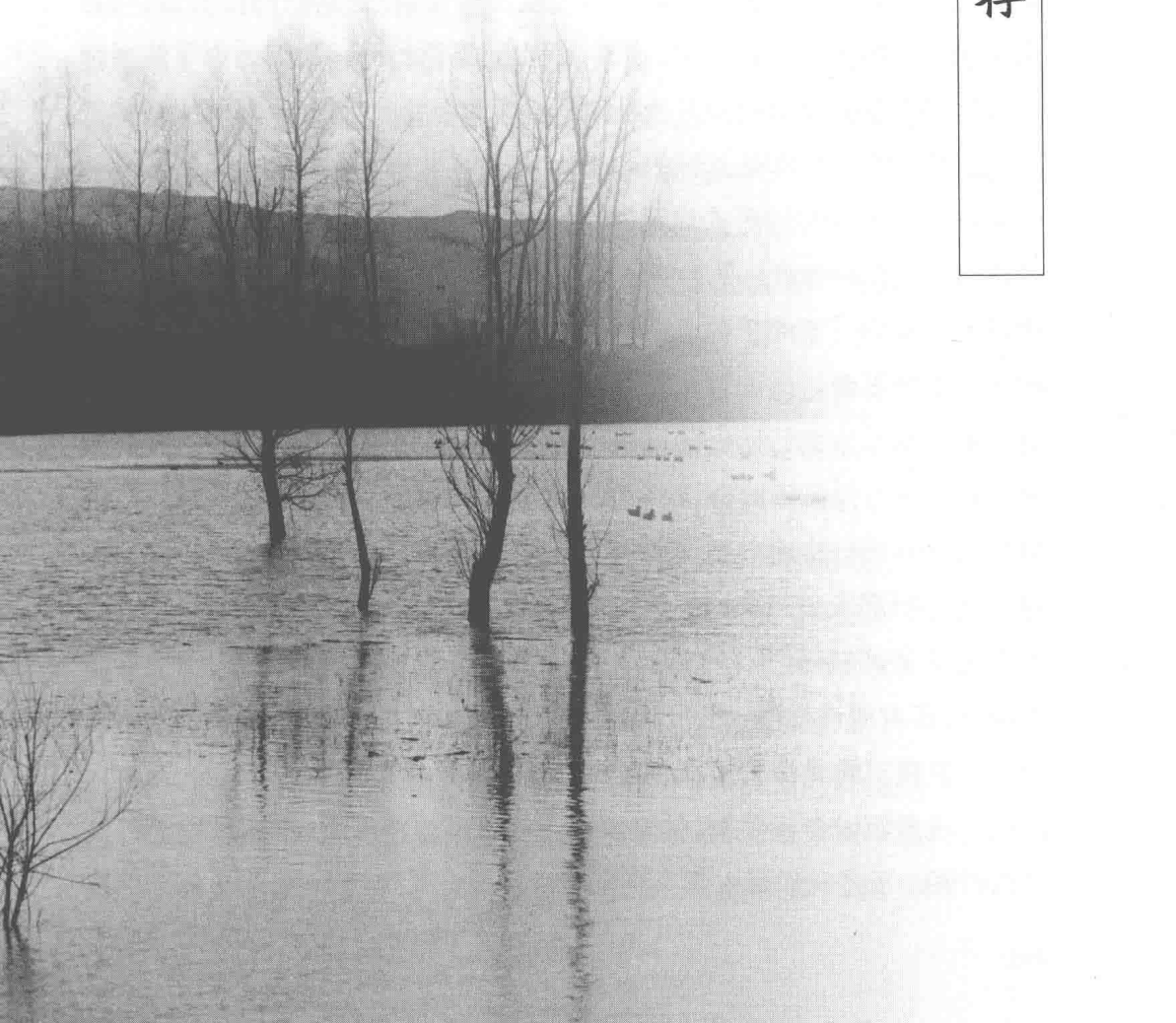
在罗马邂逅济慈 李金荣 346

散文新星

墙头上的少年 田鑫 354

最后的桑树 林纾英 364

特別
推荐



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

◎ 铁凝

喜爱一个作家的作品，是不能不读他的自传的。每当我读过那些大家的自传后，就如同跟随着他们的人生重新跋涉了一遍，接着很可能去重读他们的小说或诗。于是一种崭新的享受开始了，在这崭新阅读的途中，总会有新的美景突现，遥远而又亲近，陌生而又熟稔——是因为你了解并理解着他们作品之外的奇异人生所致吧。读许金龙先生最新译作《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即是这样的心情。

这是一部以对话形式展开的作家自传，大江健三郎面对采访者，坦然尽述五十年作家生涯。他的讲述缜密而细腻，深邃而质朴。你甚至能够听得见他平缓却并不滞重的语调，这使我不断想起和大江健三郎先生两次印象深刻的见面。

第一次是在二〇〇〇年初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为应邀来访的大江先生举办作品研讨会，我和数位作家同行被邀请参会。那时我刚从俄罗斯旅行回来，旅途中阅读的唯一一本小说即是大江先生的《燃烧的绿树》。还记得那天研讨会的气氛庄重、朴素、热烈。大江先生身着典雅、内敛的黑色正装，安静地坐在那里，倾听中国同行对他作品的评价，神情专注而谦逊，还有些许拘谨。当时，正是这些许的拘谨打动了我，我仿佛从中看到了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师不事表演的心灵本色。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大江先生婉拒研讨会设午宴，他建议与会者以盒饭为午餐，说这样既简朴又节约时间。于是我们每人都拿到了一份盒饭。写作几十年，我也算参加过

一些研讨会，似乎极少经历过盒饭午餐。

第二次和大江先生见面是二〇〇六年十月，我应邀同中国社科院代表团一道儿，赴东京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东京会馆的纪念酒会结束后，大江先生特别邀请代表团一行有半小时恳谈。那天的大江先生仍然是典雅的黑色正装，他比六年前多了些温和，而且更健谈了。我们围坐在酒店一隅的一张长桌边，细心的大江先生还专为大家叫了茶和点心。那天的恳谈，大江先生说起了少年时受母亲的影响阅读鲁迅的小说，说起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孔乙己”“咸亨酒店”这些名字从小他便熟知。当说到有一次母亲很自豪地告诉他，“你父亲会写三种茴香豆的‘茴’字”时，大江先生笑起来。那一瞬间他的笑既开心又天真。他还讲起对钱锺书先生的尊敬，对莫言作品的尤其喜爱。然后大江先生把目光转向我说：“我们的两次见面，你给我的印象是年轻、勇敢。中国的女作家是不是都很勇敢呢——敢于向年长者发问？”和大江先生的年龄相比，我是年轻的。说到勇敢，我想起在六年前的那次研讨会上，会前我和一位文坛前辈的悄声对话一定让大江先生感到有趣，我惊异于他敏锐的观察力。但让我更加感动的是，大江先生对当代中国作家的良好情感和热切期望。我曾不止一次听说，大江先生会在合适的时候亲自率日本的优秀青年作家访问中国，他期待日本的青年作家和中国的青年作家在中国或日本一道儿旅行，能有更多时间更深入地在旅行中交流文学，畅谈人生。这样的话题使大江先生很兴奋，当谈及这些时，他一扫我在六年前见到的拘谨，他的神情呈现出年轻人的清新和热烈，原本半个小时的恳谈延长至一个小时。就在这时，我仿佛看到了眼前有一棵“燃烧的绿树”。后来，当我阅读大江先生这部自传时，那种既沉静又燃烧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

这是一场阅读的盛宴。魅力来自给人的心灵以垂直打击的思想的力量，来自作家对语言和想象力不败的激情与敏感，来自作家既谦逊又自信地对文学永不满足的追问，来自作家精神深处极度绝望中的壮丽希望。生

于日本四国森林的大江健三郎，通过他的文学生涯和他的鲜明人生，以穿越时空的刚健而又轻灵的笔触，以彻底的自由检讨的姿态，以对日本、对亚洲、对世界、对人类永不疲倦的严厉的审视与希冀，把他人生中明亮的忧伤、苍凉的善意、克制的温暖和文学中积极的美德呈现给读者。我从中望见了语言的森林、精神的森林、人生的森林。这森林静谧幽深，辽远阔大，丰沛、隐秘的地下水浸润其间，使森林朝气不衰，使绿树能够燃烧，而火焰却让绿树枝叶繁盛。

这是一位深度介入社会现实，奋不顾身地以生命致力于呼唤世界和平的作家，一位在小说艺术上对自己极为苛刻、在技艺上决不退让的作家，一位用小说的方式，却把诗的沉静的又是荆棘般的锐利植入读者心中的作家。小说何以成为小说？想象力何以诞生，又究竟源自哪里？“神话素”如何在心里养育？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追逐到语言的圣性、魅惑，语言的神秘之光？何为大江小说中重要资产的构造？以及作家本人被村子和东京撕裂的人生悲欢的新奇，他的以全部作品和整个人生做赌注，追究战后五十年以来日本虚与实的不退让之意志……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大江先生在自述中对那些影响了他文学和人生的哲人、学者、作家的由衷敬意。他不仅坦言“作家的实际生活从古典文学里得到了鼓励和救济”，更是谦虚地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写作称为训练长篇小说的写作。当我读到大江先生四十多年来，每天夜里都要为残疾儿子光裹好毛毯才入睡时，不禁生出和采访者同样的感慨：大江先生的小说是不可思议的，大江先生的人生同样不可思议。大江先生实在是拥有特殊意志的人，而赋予这特殊意志之力量的人，正是他的残疾长子——光。在日本交响乐团纪念莫扎特诞生二百五十周年的“安魂曲”演奏会上，大江先生应邀赠诗一首：

我无法从头再活一遍，
可是我们却能够从头再活一遍。

也许这就是一个作家独有的对“活”和“生”的“奢侈”见解吧，这是文学和儿子光给予大江先生的悲怆而又强韧的奢侈。这时我还听见了大江先生在他的小说中，借对一位即将分娩的女性的敬慕表达出的对人类未来的新期待：

我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倾听那里正无言讲述着的内容，倾听着用既非英语亦非日语，大概是为“新地球”而准备的那种宇宙语言朗诵的叶芝的那些诗行……我感觉你将产下比最新之人更新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新的人。

在此，我不能不把这些句子看作对未来无限明丽而又昂扬的祝福，是文学新景象和伦理想象力的新憧憬。

此刻我也正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倾听大江先生的自述。当我在大江先生的书中看见森林和绿树之后，更知晓了倾听的要紧。仅有“看见”是不够的，你必须有能力倾听，才有可能抵达一座森林隐秘的深部。

大江先生在自述中言及少年时，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他被赋予一种特别的身份：那时村里正流行踩高跷，他被优先请去踩高跷。那是一副非常高的高跷，踩在上面能看到家里二楼的窗子。人在高跷上那突然变形的行走，突然视野的开阔，村子里的景观突然的变样，使敏感的少年大江突然获得了一种奇异的高度。此时我仿佛看见少年的大江有些别扭地踩在高跷上，孤独，倔强，紧张，勇敢。他起步并受惠于森林，而最终，他站在了森林之上。

那其实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大江先生以他创造的文学的和精神的高度，以他无可比拟的厚度和重量，荣耀了日本现代文学，使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同时他的形象已经超越了他的民族，成为整个人类文化财富

的一部分。而时光的流逝,将使大江健三郎文学的内在价值和他对社会发言的历史意义得到愈加丰满的凸显。

二〇〇八年

相信生活,相信爱

汪曾祺老离开我们十三年了,但他的文学和人格,他用小说、散文、戏剧、书画为人间创造的温暖、爱意、良知和诚心,却始终伴随着我们。

汪曾祺先生总让我想到母语那无与伦比的优美和劲道。他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尤其是对中、青年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大而深刻的。一位青年评论家曾这样写道:“在风行现代派的八十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动,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他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因而又显出特别的‘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他像一股清风刮过当时的中国文坛,在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里,他那些初读似水、再读似酒的名篇,无可争辩地占据着独特隽永、光彩常在的位置。能够靠纯粹的文学本身而获得无数读者长久怀念的作家是真正幸福的。

汪曾祺先生总让我想到“真性情”。这是一个饱含真性情的老人,一个对日常生活有着不倦兴趣的老人。他从不敷衍生活的“常态”,并从这常态里为我们发掘出悲悯人性、赞美生命的金子。让我们知道,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窃以为,当一个人不能将真性情投入生活,又如何真挚为文?有句俗语叫作“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但在汪老这里却并非如此。他的人生也坎坷颇多,他却不容他的人生如“戏”;他当然写戏,却从未把个人生活戏剧化。他的人生就是人生,就像他始终不喜欢一个形容叫作“作家去一个地方体验生活,”他更愿意说去一个地方生活。后者更多了一份不计功利的

踏实和诚朴,也就说不定离文学的本质更近了。一个通身洋溢着人间烟火气的真性情的作家,方能赢得读者发自内心亲敬交加的感情。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境界呢。能达此境界的作家为数不多,汪老当是这少数人之一。

汪曾祺先生总让我想到“相信生活,相信爱”。因为,他就是相信生活也相信爱的,特别当他在苦难和坎坷的境遇中。他曾被迫离别家人,下放到坝上草原的一个小县劳动,在那里画马铃薯,种马铃薯,吃马铃薯。但他从未控诉过那里的生活,他也从不放大自己的苦难。他只是自嘲地写过,他如何从对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还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这并不是说,汪曾祺先生被苦难所麻木。相反,他深知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艰深。他的不凡在于,和所有这些相比,他更相信并尊重生命那健康的韧性,他更相信爱的力量对世界的意义。我想说,实际上汪曾祺先生的心对世界是整个开放的,因此在故事的小格局里,他有能力呈现心灵的大气象。他曾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过他在那个草原小县的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北京与家人短暂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家,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极其鲜美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七日,汪曾祺先生忌日的第二天,我去福田公墓为汪曾祺先生献花。那天太阳很好,墓园十分安静。我随着立在路边的指示牌的引导,寻找汪老的墓碑。我终于在一面指示牌上看见了汪老的名字,那上面标明他的位置在“沟北二组”。沟北二组,这是一个让我感到生疏的称谓。我环顾四周,原来一排排墓碑被一行行生机勃勃的桃树环绕。几位农人模样的男子正散站在树下仔细地修剪桃枝。从前这里说不定就是村子里的一片桃园吧。而此时的汪老,就仿佛成为这个村庄被编入“沟北二组”的一名普通村民。记得有一篇写汪老的文章里说,汪老是当代中国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以汪老的人生态度,以他的真性情,“名士”“村民”或

者都不重要,若硬要比较,也许汪老更看重过往生命的平实和普通。我在汪曾祺先生与夫人合葬的简朴的墓碑前献上鲜花,我再次确信,汪老他早就坦然领受了头顶上这个再寻常不过的新身份,这儿离有生命的树和孕育生命的泥土最近。走出墓地时我才发现进门处还有一则“扫墓须知”,其中一条写道,“有献鲜花者,务请将花撕成花瓣撒在墓碑四周以防被窃”。但我没有返回“沟北二组”把鲜花撕成花瓣——心意已经在那儿,谁又能真的偷走呢?

今天,在汪曾祺先生的家乡,怀念他、热爱他的人们以这样的规模和如此的隆重来追忆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人物,这一方水土的文化财富,使我感受到高邮润泽、悠远的文化积淀;我也愈加觉得,一个民族,一座城市,是不能没有如汪老这样一些让我们亲敬交加的人呼吸其中的。也因此,这纪念活动的意义将会超出文学本身。它不仅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这个竞争压力大于人与人之间美好情感相互赠予的时代,依然相信生活、相信爱,也唤起我们思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当怎样珍视和传承独属于我们民族的优雅的精神遗产,当怎样积攒和建设理性而积极的文化自信。

二〇一〇年农历正月十一

“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晨,在协和医院送别杨绛先生。先生容颜安详、平和,一条蓝白小花相间的长款丝巾熨帖地交叠于颈下,漾出清新的暖意,让人觉得她确已远行,是回家了,从“客栈”返回她心窝儿里的家。

初见杨绛先生

作为敬且爱她的读者之一,近些年我有机会十余次拜访杨绛先生,收

获的是灵性与精神上的奢侈。而杨绛先生不曾拒我，一边印证了我持续的不懂事，一边体现着先生对晚辈后生的无私体恤。后读杨绛先生在其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写下“初识铁凝，颇相投”，略安。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小吴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我自然不敢，但那份放松的欢悦已在心中，我和杨绛先生一同笑起来，“笑得很乐”——这是杨绛先生在散文里喜欢用的一个句子。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熊人玩偶“蒙奇奇”……

杨绛晚年的不幸际遇，丧女之痛和丧夫之痛，在《我们仨》里有隐忍而克制的叙述，偶尔一个情感浓烈的句子跳出，无不令人深感钝痛。她写看到爱女将不久于人世时的心情：“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送别阿圆时，“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摧垮杨绛，她还要“打扫现场”，从“我们仨”的失散到最后相聚，杨绛先生独自一人又明澄勇敢、神清气定地走过近二十年。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也是一个爱的奇迹。

我还好奇过杨绛先生为什么总戴着一块圆形大表盘的手表，显然这不是装饰。我猜测，那是她多年的习惯吧，让时间离自己近一些，或说把时间带在身边，随时提醒自己一天里要做的事。

馈赠

杨绛先生有时候也会以过来人的幽默调侃老年人，一次她问我人老了最突出的标志是什么，接着自己总结说：“人老了就是该鼓的地方都瘪了，该瘪的地方都鼓了。”说得在场的人大笑起来，杨绛先生也笑——笑得很乐。在生命的暮年，杨绛仍然葆有着对生活的体贴，对他人的细心同情，对人所给予的善意的珍视。

在杨绛先生家里我们拍过一些照片，一次我把拍好的照片洗印出来请人给杨绛送上，先生收到照片后还特别写信致谢。信纸末端有一滴绿豆大的斑痕，杨绛在那斑痕旁边注明：“这是小吴不小心滴上的酱油，不是我滴的。”一句话道出了杨绛先生和小吴的融洽关系，也让我体会到一代大家对信函书写的讲究。这古典的、即将失传的讲究里洋溢着结实的人间滋味。

有一年春节我去杨绛先生家拜年。临别时，杨绛先生说要送我一的东西，然后起身走进她的小书房——那是走廊尽头一个阴面房间，杨绛先生曾领我去过。当时她告诉我，她曾多年在这个房间写作。书桌一头临着靠北的窗户，冬天，从窗缝挤进来的冷风吹在她伏案的左臂上，当时不知不觉，但经年如此，左臂关节常常疼痛，后才搬到向阳的客厅工作。我正想着北京冬天北风的“贼冷”，杨绛先生脚步轻快地返回客厅，手里拿着一只鸽灰色工字纹织锦做面的考究纸盒。她把盒子放在我眼前的茶几上，说：“这不是新东西，是件旧物，也许你用得着，”接着她怕我不接受似的指着盒子边角一块泛黄的印迹说，“你看，真是件旧物，雨水淋过呢。”我打开纸盒，原来里面盛着一只造型简约、做工极为精美的长方形黑檀木盒，木质如缎似玉、天然纹理深沉大气，盒盖中央镂刻出铜钱薄厚的两眼小孔，一块扎着细密明线的小牛皮穿孔而过，合拢后凸起在盒盖上，成为这盖子的手柄。我小心捏住这牛皮手柄掀起盒盖，见盒内由洋红色瓦楞纸做衬，整齐

地排列着五支黑色铅笔。三棱形纯黑笔杆的握笔处凸起着几排防滑的细密小圆点，笔杆尾部有 Faber-Castell 的著名标志，是德国辉柏嘉品牌。

这无疑是杨绛先生最喜欢的铅笔，她才会用贵重的黑檀木盒装了它们赠予我。也许在杨绛看来，再珍贵的黑檀，也比不过最好用的笔吧，虽然它们只是几支铅笔。我愈加感受到杨绛先生这馈赠的深情厚谊，她的别致典雅，她无言的期待和祝福，如深谙世间冷暖的明智长者，或是可以畅叙闺中喜忧的“杨绛姐姐”？

爱不枯萎

一次杨绛先生问到我的个人生活，说什么时候想要见见我先生。二〇一三年春节前，我和先生同去杨绛先生家拜年。杨绛仔细端详着我的先生，扭头笑盈盈地对我说了夸奖逗趣他的话，那慈爱的神情，就像我的娘家人一样。我们聊了一些家事，还讲到我们的女儿。杨绛先生嘱咐说：“下次来，送给我一张你们的全家福吧，照片背面要写上字呢。”

二〇一四年四月，我和先生再次拜访了杨绛。杨绛先生在其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记录了这次见面：“下午铁凝、华生同志来，说说笑笑，很高兴。”那确是一次轻松快乐的见面，杨绛先生身心放松的平静心绪感染着我们，闲聊中只有凡俗的家常气。这些年，越是和杨绛先生见面，就越是感受到她身上的家常气。柴米油盐和学问著述从未在她这里成为对立。

我们遵嘱送给杨绛先生一张全家福照片，她看着照片上的女儿，叫着孩子的名字，好像孩子已经站在她的眼前。

杨绛先生比我们的女儿整整大了一百岁，当她看着照片上的孩子时，仿佛时光倒流，她的神情刹那间呈现出稚童样的活泼。

我在今年春节前给杨绛先生拜年时，刚刚坐在她的身边，面容已显出疲惫、形态也显出虚弱的杨绛先生，开口便先问起了我们的孩子。她清楚、准确地叫着女儿的名字说：“豆豆好吗？”这让我意外而又感动。时隔一年